

### 三 戊戌维新与明治维新 成败原因的比较

中国的戊戌维新与日本的明治维新从表面现象来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两次变法维新，历史背景相近，时间相隔不远，先后发生在 19 世纪下半叶受到西方势力冲击的两个东亚封建国家——日本和中国。它们的目标类似，措施雷同，都是向西方学习，主要通过政府发布命令推行改革，目的是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国家。而且戊戌维新本身就是以明治维新为蓝图进行的，真可谓是何其相似乃尔！然而，两者的成效、结局和命运却又是那样的不同。日本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实现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走上了资本主义近代化的道路。不仅维护了民族的独立，而且使日本成为亚洲唯一的帝国主义强国。而中国的戊戌维新却如昙花一现，迅速失败，光绪皇帝被幽禁，维新人士遭镇压，改革新政全成泡影。中国不但没有阻挡住帝国主义的瓜分狂潮，而且在半殖民地深渊里越陷越深。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 (一)

戊戌维新刚刚失败，流亡到日本的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就开始通过对比中国戊戌维新与日本明治维新的异同来总结中国变法失败的原因。1898 年 10 月 6 日，即梁启超到达东京的第 6 天，他就写信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陈述中国戊戌维新与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的经过，要求日本政府设法营救光绪皇帝。这封

信很长，而其中相当大的篇幅比较分析了两国维新运动的成败原因。此信见于中国史学会 1953 年编辑出版的《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上，被称为《新党某君上日本政府政党论中国政变书》，作者佚名。编者案语说：“此文疑是梁启超之作，见于《知新报》七十九册页四，转录于日本东邦协会报。”今天，我们已从日本史料中得到证实，此信确为梁启超所作，原件存于《大隈文书》，并被收入《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十一卷内公开发表。

梁启超在信中认为中国戊戌维新时的情况与日本明治维新前夕“安政庆应之时，大略相类”。“皇上（指光绪）即贵邦之孝明天皇也，西后即贵邦之大将军也，满洲全族即贵邦之幕吏也”。中国的变法比起当年日本明治维新来有三个方面的不利条件。第一，“贵邦幕府虽威福久积，然于皇室则有君臣之分”。因此日本维新志士一旦打出拥护天皇，“尊王讨幕”大旗，“以君臣大义名分”作号召，立刻能得到四方响应。“敝邦西后则朝权久据，且于皇上冒母子之名。故讨逆幕，则天下之人皆明其义。语及西后，则天下之人或疑其名”。中国维新派尽管也打起拥护皇帝的旗号，却没有多大号召力。第二，“贵邦天皇与将军，一居京都，一居江户，不相逼处”。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两个政治中心，“故公卿处士之有志者，得出入宫禁，与天皇从容布置，而幕府无如之何。敝邦则皇上与西后同处一宫，声息相闻，且皇上左右皆西后之私人，皇上所有举动，西后无不立知。故此次仅下一密谕，图自保之法，而祸变已起矣”。对此，康、梁是深有体会的。而且，“一旦废立，即使外省有举义之兵，兵未及京都而彼已可立置皇上于死地，是皇上直为西后质子也”。即使起兵勤王，光绪也是慈禧太后手里的人质，很难保全。第三，“皇上手下无尺寸之兵权，与当时贵国之皇室略同。然当时贵国有萨、长、土、佐诸藩相与夹辅，故虽藉处士之功，尤赖强藩之力。藩侯自君其国，经数百年，本藩之士民皆其赤子，彼一举义，幕府无如之何。甚者如毛利公父子，黜其爵、讨其罪而已，而终不能削其兵力，禁其

举义也。故王室得其维持，而志士有所凭藉”。明治维新时，天皇可以依靠萨摩、长州等强藩的武力并作为基地。中国维新派也多么想把湖南等省变成中国的维新基地啊！可是，“若敝邦则不然，各省督抚数年一任，位如传舍，顺政府之意，则安富尊荣，稍为拂逆，授意参劾，即日罢官矣。即如此次之事，湖南为人才之渊藪，大邦之长门也。而政变数日，即已将陈宝箴、黄遵宪、徐仁铸等一概罢斥，而一切权柄皆归守旧之徒，无复可用矣。处士以一身毫无凭藉，惟有引颈就戮而已”。<sup>①</sup> 光绪皇帝与维新派人士既无军队又无基地，故而在顽固派发动政变时毫无抵抗之力。

梁启超在信中还比较了中日两国维新时国际形势的不同。他说：“贵邦三十年前，外患未亟，其大忧仅在内讧，故专恃国内之力，而即可以底定。敝邦今日如以一羊处于群虎之间，情形之险，百倍贵国。”指出中国戊戌维新是处在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险恶形势下，已经与六七十年代日本明治维新时的国际形势大不一样了。梁启超列举了中国变法的这些“难处”以后，悲愤地说：“以故帝后合体之事，既无可望，尊帝讨逆之事亦不能行。此敝邦志士所以吞声饮恨，血泪俱尽，志计俱穷，以至于今日，而我皇上之位卒岌岌不能保，敝邦改革之事遂废于半途也。”<sup>②</sup>

康有为亡命日本后，在给日本人依田百川的信中谈到戊戌维新的失败原因时，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然我国之帝后，犹贵国之有公武也（指日本的天皇与幕府）。帝后之隙已深，亦如贵国万无公武合体之理。然贵国公武异处，而我则帝后同居；贵国王室与幕府，犹有君臣之分，我朝皇上与西后，尚牵母子之

---

<sup>①</sup> 《新党某君上日本政府政党论中国政变书》，《戊戌变法》（二），601—608页；又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696—699页。

<sup>②</sup> 同上。

名。同居则行事甚难，假名则群臣易惑，既猜忌甚至，故布置甚难。”<sup>①</sup>

应该承认，康、梁二人尤其是梁启超采取对比分析中日两国维新异同的方法，触及到了戊戌维新失败的一些具体原因。但是大多尚停留在表面现象，而且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尤其是他们始终把中国维新变法成败的决定因素归结于光绪皇帝一人之身。梁启超在给大隈的信中反复强调中国“之能改革与否，全系乎皇上帝位权之安危”。他甚至声称：“但使皇上有复权之日，按次第以变法，令行禁止一二年间，一切积弊，可以尽去，一切美政，可以尽行。”<sup>②</sup> 因此，政变以后，康、梁仍然死死抱住光绪皇帝不放，当新的革命高潮到来之际，依旧反对用暴力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终于堕落成为反动的保皇派。

## (二)

如果按康、梁的分析，光绪与慈禧要是没有母子之名分，不住在一地，那末变法能不能成功呢？戊戌维新的失败究竟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呢？尽管戊戌维新失败的原因错综复杂、千头万绪，我们仍然可以采取与日本明治维新对比的方法，来进行层层解剖分析，找出其症结与根源。

列宁曾经说过：“政治事变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子。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决不能你想抓住哪个环节就故意挑哪个环节。”<sup>③</sup> 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成败的关键是资产阶级和维新势力能否掌握政权。只有在推翻或彻底改

---

① 康有为：《复依田百川君书》，《康有为政论集》（上册），393页。

② 《新党某君上日本政府政党论中国政变书》，《戊戌变法》（二），601—608页，又见《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696—699页。

③ 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列宁选集》第4卷，649页。

组封建旧政权，确立和巩固资产阶级新政权的前提下，才能保证资产阶级改革措施的推行，保护和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否则一切都要落空。日本明治维新实现了这个变革。首先是维新志士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打击幕府，并控制了一些强藩的政权，建立了倒幕的武装力量和基地。1867年（日本庆应三年）底，维新势力以天皇名义宣告“王政复古”，废除幕府，命将军辞官纳地。幕府旧势力当然不肯自动交出政权，1868年（明治元年）初，经过戊辰战争几个月的武力较量，打败了幕府的军队，建立起明治新政府，并继续镇压幕府势力的反抗，直到1869年5月榎本武扬投降，幕府武装力量才被彻底消灭。明治新政权确立后，逐步进行政权建设，把原来以将军为首的幕府领主阶级的封建政权改造为以天皇为首、维新派下级武士为核心、代表资产阶级与地主联合专政的新政权，并通过一系列官制、机构的改革，使这个政权得到巩固和健全。然后，由这个强有力的新政权来发布命令，逐步进行除旧布新的各项重大改革，如奉还版籍（1869）、废藩置县（1871）、改革封建身分制度（1869至1873）、废除封建俸禄（1876）、地税改革（1873）、教育改革、殖产兴业、修改不平等条约，最后制定宪法（1889），召开国会（1890），使日本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国家，基本上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

与日本相比，中国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却始终没有真正取得政权。当时，虽然名义上是光绪皇帝亲政，在百日维新期间，也发布了一系列具有资产阶级改革性质的新政诏令。但是，旧政权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最高权力仍然掌握在慈禧太后手里，重大问题的裁决、高级官员的任免，都要由她决定。中枢机关军机处与总理衙门的实权也还在守旧势力的控制下，至于中央各部尚书、侍郎以及地方拥有军政实权的总督、巡抚等大员，也绝大多数是反对维新的守旧派。京城周围的武装力量——北洋三军控制在慈禧的亲信、直隶总督荣禄手中。维新派的成员最高不过四

品卿衔军机章京（如谭嗣同、林旭），能够见到皇帝、起草谕旨而已。而维新派的首领康有为仍然是个地位很低的工部主事，仅仅见过一次皇帝，在顽固派的阻挠下，只封了个总理衙门章京这样的小官，以至他根本不愿去上班。至于维新派另一个代表人物梁启超则只是个举人，始终连个官职也没有。就是维新派所依仗的光绪皇帝本身也并无实权。他下了那么多新政诏书，在各级守旧官员抵制下，几乎都未得到贯彻执行。尽管光绪三令五申各官“不得敷衍因循”、“岂容观望迁延”、“不准空言搪塞”，甚至一再宣布“倘再藉词宕延，必予以严惩”。可是守旧官员依然阳奉阴违，敷衍了事。如两江总督刘坤一与两广总督谭仲麟对百日维新两个月里的谕令筹办之事，居然“无一字复奏”，“迨经电旨催问，刘坤一则藉口部文未到，一电塞责。谭仲麟且并电旨未复，置若罔闻”。<sup>①</sup> 梁启超对此评论道：“数月以来，新政之诏多矣，督责大臣之旨多矣，乃日日降旨严催而诸臣藐然，日云必加严惩而未闻一惩，盖上无权既久，大臣所共闻知，彼等有深宫之简界，有宦寺之奥援，岂畏此守府之君、空文之诏哉。”<sup>②</sup>

当然，中国的维新派并非不想掌权，但他们没有实力也不愿意采取激烈手段夺权，而总是幻想通过光绪改革官制，设立一些像制度局这样的机构，和平掌握政权。这种企图因遭到守旧势力的抵制而失败。以维新派视为变法关键的开制度局一事为例，康有为一再上书皇帝请开制度局以统筹新政全局，光绪也认为“事关重要”，屡次命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们“切实筹议具奏”。而守旧派大臣们认为“开制度局是废我军机也，我宁忤旨而已，必不可开”。因此竭力加以反对，并“以敷衍游辞驳之”。光绪大怒，把奏折退还，命其再议，并亲自写朱批痛斥：“无得浮词搪责，倘仍敷衍塞责，定必严办。”守旧派见明抗不行，又施阳奉

---

①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二三，14—15页。《戊戌变法》（二），60页。

② 《戊戌变法》（二），63页。

阴违、偷梁换柱之计。军机大臣王文韶说：“上意已定，必从康言，我全驳之，则明发上谕，我等无权矣，不如略敷衍行之。”结果，他们把维新派建议的“选天下通才二十人置左右议制度”，“改为选翰詹科道十二人轮日召见备顾问”，仍由旧官僚充数。这样一来，便巧妙地扼杀了制度局之议，康有为只好哀叹：“于是制度局一条了矣！”<sup>①</sup>

### (三)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研究中国的维新派为什么不能像日本的维新派那样建立新政权，实现变法。这主要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客观形势是否具备，国内革命时机是否成熟？二是主观条件是否具备，新旧势力双方力量对比如何？列宁曾经指出，从客观形势来看，“只有当‘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sup>②</sup>从主观条件来看，需要“革命阶级能够发动足以打倒（或摧毁）旧政府的强大的群众革命行动，因为这种政府，如果不‘推’它，即使在危机时代也是不会‘倒’的”。<sup>③</sup>

先比较一下中日两国夺取政权、实现维新的客观形势。在明治维新前夕，日本国内革命危机已经成熟。当时日本农民、市民暴动此起彼伏，至60年代进入高潮，空前猛烈，仅1866年一年，农民、市民暴动就达43次之多。1867年几乎在全国范围内爆发“可好啦”大骚动，致使京都、江户、大阪等地军警机构两个多月处于瘫痪状态，人民群众的斗争动摇了幕府封建统治的基础。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和分化也日益激烈。围绕批

---

①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153页。

②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239页。

③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621页。

准日美亲善条约与选择将军继承人的争论，多年不干预政治的天皇也有了政治发言权，逐渐形成了朝廷与幕府两大政治中心。强藩、下级武士普遍对幕府不满，离心倾向越来越大。1859年，幕府大老（最高执政官）井伊直弼制造“安政大狱”，疯狂迫害维新志士，第二年井伊直弼本人即被反幕派武士刺死，说明双方矛盾已经不可调和。接着1864、1865年幕府两次发兵征讨长州藩，标志着幕府与强藩的矛盾也已公开化。幕府统治处于内外交困、分崩离析的严重危机之中。维新派及时抓住时机，发起尊王倒幕，抬出天皇，宣布大政复古，并用武力讨伐幕府，取得戊辰战争的胜利，终于推翻了幕府封建旧政权，建立起维新派执政的明治新政权。

而中国戊戌维新时却没有出现这样的形势。自从1864年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失败以后，捻军、西南西北少数民族起义也相继被镇压，农民起义转入低潮。下层群众斗争方式主要是矛头对外的反洋教斗争，这种斗争有时候还受到清政府的欺骗利用。在统治阶级内部，掌握清政府大权的满族贵族，对外向外国侵略势力投降妥协，勾结起来共同绞杀中国人民革命；对内则向汉族地主势力让步，依靠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湘淮系军阀官僚镇压农民起义，办理国防外交，使清朝封建政权暂时得到巩固、稳定。统治阶级内部虽然还有洋务派、顽固派、清流派以及帝党、后党之争，但总的说来离心力不大，旧政权尚未产生严重的统治危机，推翻旧政权的时机尚未成熟。

再比较一下中日两国维新力量与守旧力量的对比。日本明治维新时，维新势力压倒了守旧势力。如上所述，以幕府为中心的守旧势力已经十分脆弱，幕府统治摇摇欲坠。而维新势力以下级武士为核心，抬出天皇为旗帜，与反幕的强藩相结合，既有基地，又有军队，而且得到町人阶层（包括商人、手工工场主、农村富农等）在财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持，广大农民、市民也积极参加或支持反幕武装，因此组成了强大的维新阵营，一举推翻了幕



府旧政权。

相反，在中国戊戌维新时，守旧势力要远远大于维新势力。守旧势力以掌握最高权力的慈禧太后为首，包括控制中央和地方军政实权的大贵族、大官僚，以及因新政措施触及其切身利益而反对维新的大小衙门官吏、绿营军官、旗人、八股士人等等，形成庞大的守旧阵营。他们手握政权、兵权、财权，富有政治经验，擅长阴谋诡计，全力以赴扼杀维新。正如梁启超描写的那样，“盖全国千万数之守旧党人，不谋而同心，异喙而同辞，他事不顾，而惟阻挠新法之知”。<sup>①</sup>而中国的维新势力仅以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为核心，依靠没有实权的傀儡皇帝光绪，联合少数帝党官吏、御史翰林及地方官员。既没有基地，也无兵权、财权。他们轻视并脱离广大人民群众，连资产阶级、商人也很少关心支持他们。维新思想家严复指出当时维新派“与守旧党比，不过千与一之比，其数极小”。<sup>②</sup>力量对比实在太悬殊了！因此，守旧势力一反扑，维新势力顷刻瓦解。谭嗣同在壮烈牺牲前，也只好仰天长叹：“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sup>③</sup>

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无力，其根源还在于它所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弱小。这个阶级70年代刚刚诞生，先天不足，又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发展缓慢。到19世纪末，真正属于民族资本的企业，也只有几百家厂矿，而且投资少、规模小、设备差。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实力薄弱，社会基础狭小，而且从娘胎里带来了软骨病——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妥协性。这些特性也必然会表现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身上，如对封建主义的妥协让

---

① 梁启超：《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戊戌变法》（三），34页。

② 严复：《论中国分党》，《戊戌变法》（三），76页。

③ 谭嗣同：《临终语》，《谭嗣同全集》上册，287页。

步、对帝国主义的幻想依赖以及对人民群众的害怕等等。

我们还应该看到个人因素在历史上所起到的作用。维新派领导人的能力、气质和采取的方法、策略，与维新成败也有很大关系。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中日两国维新运动的领导人，他们有相似之处，如大多是出身封建家庭的资产阶级化知识分子，年龄正当中青年，血气方刚，忧国忧民。多数曾接触过西方思想文化，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然而，不同的是日本维新派骨干是中下级武士，大多参加过地方上的藩政改革，久经风浪锻炼，具有斗争经验与政治才干。如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伊藤博文等人，都是一批富于谋略、精明强干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们善于争取各种力量，讲究斗争策略，例如在政府内排除保守派、废除贵族特权、制订宪法、召开议会、修改不平等条约，都是采取稳扎稳打、减少阻力、逐步推进的策略，以至能够逐渐实现其目标。而中国维新派的骨干却基本上是一批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书生，大多饱读诗书，有才学热情，却往往缺乏运筹帷幄的雄才大略。梁启超就承认他的老师康有为“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者”。<sup>①</sup>老奸巨滑的李鸿章也把他们视为“书院经生、市井讼生之流，不足畏也”。他们在维新措施和斗争策略上也有些急于求成，不顾实效。如变法一开始便裁撤旧衙门、裁减绿营、令旗人自谋生计，激起守旧势力群起攻之，增加了变法的阻力。同时又不善于团结和争取同盟军，结果使自己十分孤立。

#### (四)

中日两国的维新运动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不同点，恐怕还应该更深入地从两国国情的不同，尤其是从两国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

---

<sup>①</sup> 梁启超：《康有为传》，《戊戌变法》（四），36页。

的区别中探讨其根源。

从社会政治结构的角度来看，日本一直是个封建领主制国家。德川时代是幕藩体制，这个面积不算大的岛国上竟有 260 多个割据的藩，而每个藩的领主（大名）都拥有独立的而且是世袭的军政实权，潜伏着很大的离心力，因此维新派的尊王倒幕号召，客观上符合当时日本建立统一民族国家和统一国内市场的要求，故而能获得各阶层的响应和支持。而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地主制国家。这种中央集权制度到了清代更加完善、严格，中央政府通过郡县制控制地方，又通过科举制选拔官吏，不允许地方上形成世袭的独立势力，地方官员随时可以被罢免、调动，因此难于形成离心力量。维新派提出的地方自治的主张也很难付诸实践。

从社会经济结构来看，在日本封建领主制度下，商品经济比较容易发展，农村自然经济解体的速度也比中国要快。明治维新前日本棉纺织业手工工场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农作物商品化并逐步同资本主义生产结合起来。由于日本国土小，资本主义萌芽的密度大，并形成了几个经济中心。在某些藩，富商拥有大量财产，并成为藩主、武士的债权人，从而控制了藩的财权和工商业。城乡资产阶级尤其商人和豪农成为维新派的重要社会基础，他们积极支持倒幕和改革，在明治维新中起了重要作用。相比之下，在中国封建地主土地制度下，自然经济瓦解很缓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抵抗也很顽强。分散经营的小商业反而成为自然经济的附庸，城市商业资本往往脱离生产领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并不是从封建社会后期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独立发展而来的（这种萌芽在外国入侵后大部分已被扼杀），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刺激下，由地主、官僚、商人、买办投资新式企业而产生的。这种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畸形发展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既先天不足，缺乏原始积累，又后天失调，力量薄弱，而且与外国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因此作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阶级主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却很少有人直接参加或支持戊戌维新。虽然也有张謇等少数几个资本家参加了维新运动，但仍怕变法过于激进，“一再劝勿轻举”。戊戌政变后，张謇又赶紧声明：“余与康梁是群非党，康梁计划举动，无一毫相干者”，<sup>①</sup> 惟恐遭到株连。

还有两国文化历史传统的不同也值得注意。日本自古以来有向外国学习的历史传统，古代着重学习中国文化，近代以来又大量吸收西方文化，并能与自己的民族文化相融合。因此，明治维新推行文明开化政策，阻力较小，成效显著。另外，日本历来提倡武士精神，崇实而不尚虚浮的理义空谈，这种精神对变法改革也是有利的。相反，中国是文明古国，知识分子往往背上中华文化优越感的包袱，提倡学习外国往往遇到很大阻力。不少人还崇古好古，相信祖宗之法不可变，喜欢脱离实际的空谈。加上长期以来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科举八股制度束缚知识分子头脑，这些都对维新改革很不利。

此外，中日两国维新时所处的时代与国际环境上的差异也不应忽视。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 19 世纪 60 年代末，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也尚未开始。而西方列强在东亚侵略的主要目标是地大物博的中国，加上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中国太平天国革命对西方列强力量的牵制，都为日本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当时列强的态度，英、美曾积极支持日本维新势力，并给予军事上和物质上的具体援助。日本维新派本身也比较注意外交斗争策略，尽量利用英法、英俄之间的矛盾。而中国戊戌维新已经到了 19 世纪 90 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列强通过争夺殖民地的高潮已经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毕。中国成了列强在东方争夺的“惟一富源”，一时间出现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时帝国主义列强

---

<sup>①</sup> 张孝若：《张謇年谱》，《戊戌变法》（四），201—202 页。

决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当时，英国与日本，虽然为了抵制俄国的扩张，曾对中国维新运动表示同情并拉拢维新派，但始终未能给予实质性的具体援助。

总之，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与中国戊戌维新的失败决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其内部、外部的历史条件和种种复杂的因素所造成的，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根源。从两者的对比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很多有益的经验教训。唯物史观认为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在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下，维新派君子们也只好演出这样的一幕悲剧。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日本明治维新虽然成功了，但它保留了浓厚的封建残余，鼓吹对外扩张，培植军国主义，也给日本的社会发展投下了阴影。中国戊戌维新虽然失败了，但维新派大声疾呼爱国救亡，介绍西方政治学说，进行了大量的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加上变法失败的教训和维新志士的鲜血，使很多青年从此觉醒，逐渐走上了革命道路。戊戌维新是中华民族觉醒和中国民主革命历程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应埋没的。